

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中东伊斯兰 国家间关系的影响

刘中民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山东青岛 266071)

摘要: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不仅对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也中东伊斯兰国家间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激活了中东伊斯兰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伊斯兰复兴运动也对中东伊斯兰国家间的关系产生了一定的整合作用。本文以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伊朗与伊拉克的关系为例,分析了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中东伊斯兰国家间矛盾与冲突的影响,并以伊斯兰会议组织和冷战后伊斯兰世界的国际合作为例,分析了伊斯兰教在中东伊斯兰国家国际合作中的作用。

关键词:伊斯兰复兴;中东伊斯兰国家;冲突;合作

中图分类号:B9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04)05-0058-05

伴随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和高涨,“不仅在伊斯兰世界,甚至在国际政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只要它与伊斯兰教有一定的牵连,不考虑伊斯兰教的因素就无法理解、无法说明,从而就弄不清问题的症结所在”^[1]。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不仅对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分化组合与中东政治格局的演变和重组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中东伊斯兰国家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西方的关系产生了强劲的冲击,进而影响和渗透到整个国际政治当中,加之中东地区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和该地区存在的复杂的民族矛盾、边界争端,伊斯兰复兴运动所产生的震荡性影响又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地区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由于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中东国际关系的影响涉及的内容和领域极其广泛,因而本文主要选择若干具有代表性的重大问题,分析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中东伊斯兰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并以此作为透视伊斯兰复兴运动对国际政治影响的窗口。

一、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矛盾斗争与冲突

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由于共同信仰伊斯兰教,因而伊斯兰教一直是整合中东伊斯兰国家的重要文化根基。但是,因为伊斯兰教教派的多样性及其彼此间的复杂矛盾,以及民族和国家利益矛盾、历史积怨、边界争端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伊斯兰教所内含的裂变性又使得中东伊斯兰国家间的关系充满了盘根错节的矛盾。对中东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一直是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伊斯兰教无疑构成了这种斗争中为主要伊斯兰大国所倚重与利用的重要政治资源和政治语言,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又使得伊斯兰教在这种斗争中的政治功效进一步强化。

(一)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两强争夺中的伊斯兰因素

收稿日期:2004-05-07

作者简介:刘中民(1968-),男,河北迁西县人,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理论与当代中东问题。

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前,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以下简称沙特)的关系虽然并不融洽,但由于共同反共、反苏并都与西方关系较为密切,同时又要共同面对伊拉克复兴党的威胁,因而双方尚能相安无事。

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双方分别作为传统温和的伊斯兰势力与激进的伊斯兰势力的代表,矛盾斗争开始凸现于两国的关系当中。沙特是中东传统伊斯兰势力的代表,保持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沙特外交政策中的伊斯兰原则主要是以圣地的保护者和伊斯兰盟主自居,其具体表现是:大力宣扬伊斯兰团结,通过伊斯兰教的国际组织推行泛伊斯兰主义;利用丰厚的石油收入对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和宗教事业进行援助;在重大的涉及伊斯兰世界的国际问题上充当伊斯兰国家利益的代言人,强化自己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建立了现代伊斯兰神权政体,这似乎应该成为双方关系改善的契机,但却加剧了双方的矛盾与对立。从权力政治的角度看,双方关系的背后是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角度看,双方在宗教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与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对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威胁,无疑是双方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

尽管沙特和伊朗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但两国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实行的是议会选举制的共和国,沙特则是实行家族世袭制的君主国。根据伊斯兰革命精神领袖霍梅尼的理论,“伊斯兰政府不应是君主制,君主制是反伊斯兰的”^[2](P47-48)]。所以,无论沙特王室政府的伊斯兰色彩如何浓厚,其家族世袭的君主政体本身就是伊斯兰革命的对象。霍梅尼把沙特王室的伊斯兰教称为“湮神”的宗教,不承认沙特具有圣地保护者的资格。同样,沙特也认为霍梅尼的伊斯兰教是“异端”,伊朗政府的所作所为都是违反伊斯兰精神的。“伊朗的群众性的、革命的伊斯兰教与沙特的家族式的、保守的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就如同‘神权’与‘世俗’的矛盾一样,是水火不相容的。”^[3]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把海湾诸国视为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对象,这不仅直接对沙特本身构成威胁,而且也作为沙特势力范围的海湾各小国产生了严重威胁。伊朗革命的榜样以及伊朗通过广播、电视、书籍、报纸宣传伊斯兰革命,对沙特的穆斯林民众产生了强劲的冲击。从1979年到80年代中期,沙特出现的几次麦加朝觐事件,都与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有关。此外,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推行强烈的反西方政策,沙特却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重要盟友,双方经常发生唇枪舌剑。伊朗谴责沙特是“美国利益的代理人”,沙特的伊斯兰就是“美国牌号的伊斯兰”,号召沙特的穆斯林推翻“非伊斯兰”的君主制度,沙特则指责霍梅尼“在穆斯林中间制造不和”^[4]。

伊朗与沙特的矛盾和分歧,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整个波斯湾地区局势的紧张,两伊战争的爆发又使海湾国家更加感到了来自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威胁。伊朗与沙特的关系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1984年,沙特击落伊朗一架战斗机,伊朗则通过袭击沙特的油船进行报复。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所导致的伊沙关系的恶化还导致了海湾诸国关系的重新组合,与沙特有领土争端的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开始向沙特靠拢,并捐弃前嫌,开始联合。为了防范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的蔓延,沙特等国不仅在两伊战争中采取了支持伊拉克的态度,而且还在1981年成立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加强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合作,共同对付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威胁。沙特由于在人口、自然资源、经济、军事实力等方面的优势,成为海湾合作委员会的盟主。因此,沙特和伊朗作为伊斯兰传统势力与激进势力的代表,它们之间尖锐的宗教对立和冲突,对海湾地区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产生了重要影响。“与伊朗—伊拉克之间神权和世俗的矛盾相比,伊朗—沙特阿拉伯之间这种伊斯兰教不同体系的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其表现更为复杂,斗争更为激烈,影响更为深远,因而更不容易得到彻底的解决。”^[3]

(二)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两伊战争

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伊朗与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国家的矛盾斗争是激进与传统伊斯兰势力对立的产物,那么两伊战争则是激进伊斯兰神权势力与世俗的阿拉伯复兴党之间矛盾对立的产物。

持续八年之久的两伊战争是战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持续时间较长、损失惨重的战争之一。从其性质而言,并非纯粹的宗教战争,双方的历史积怨、边界争端以及对海湾地区领导权的争夺都是战争的重要原因。但双方输出与抵制伊斯兰革命的矛盾和教派矛盾交织在一起,无疑构成了诱发和影响两伊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

伊朗和伊拉克均为伊斯兰国家会议组织成员国,伊朗穆斯林中有96%属于什叶派,逊尼派仅占4%。在伊拉克,60%的穆斯林为什叶派,40%为逊尼派。历史上由于人数众多的什叶派社团的存在,两国的宗教界之间有某种宗教情感和密切交往。长期以来,伊朗的什叶派穆斯林一直对伊拉克境内的三大宗教圣地充满敬仰,而伊拉克的什叶派社团则经常寻求伊朗什叶派的支持。上世纪70年代伊拉克带有政治倾向的什叶派组织,如伊斯兰宣教党、法蒂玛党、伊斯兰革命党、圣战者组织大都有伊朗的背景^[4]。

在伊拉克,人口上什叶派占多数却由逊尼派长期执政,并长期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什叶派由于长期处于被压迫地位而对逊尼派复兴党政权十分不满,什叶派骚乱时有发生,但均遭到了复兴党政权的残酷镇压。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拉克什叶派运动再度高涨,狂热的什叶派教徒发动的数次暴动再次遭到镇压。伊拉克所推行的世俗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伊朗的神权政治纲领背道而驰,早就引起了伊朗霍梅尼政权的强烈不

满,萨达姆推行的镇压和压制什叶派的政策更令伊朗仇视,霍梅尼还对他流亡期间在伊拉克遭到的冷遇耿耿于怀。从地缘的角度看,伊拉克也被伊朗视为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前沿阵地。霍梅尼认为,只有推翻逊尼派萨达姆政权并在伊拉克建立伊朗式的什叶派政权,才能消除其继续向西部海湾地区输出伊斯兰革命战略的障碍。

在伊朗的影响和策动下,伊拉克什叶派教徒不断揭竿而起,起义连续不断,其规模和强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萨达姆深深感到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强大威胁和来自霍梅尼的咄咄逼人的政治挑战。伊拉克政府迫于政治压力,宣布伊拉克的宣教党为伊朗的“第五纵队”,逮捕了什叶派精神领袖巴克尔·沙德尔并于1980年以“叛国罪”判处其死刑。此后双方的攻击和谴责不断升级,双边关系急剧恶化。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发起了对伊朗的军事进攻,持续八年之久的两伊战争全面爆发。伊朗坚持向伊拉克输出伊斯兰革命战略,而萨达姆企图以战争对付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输出伊斯兰革命与抵制伊斯兰革命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两伊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两伊战争爆发后,双方都充分利用伊斯兰资源的政治功效,把战争上升到“为真主而战”的高度。伊朗号召穆斯林以圣战保卫伊斯兰教,极力煽动穆斯林教徒的宗教感情和宗教狂热,并组成了伊斯兰自卫队,在战场上发起残酷的自杀式的冲锋,以“完成真主的使命”。一向推行世俗民族主义的萨达姆也不断利用伊斯兰教鼓舞民族士气,萨达姆手捧《古兰经》的照片充斥各种传媒。在狂热宗教情感的支配下,两伊战争进行得异常残酷,并成为“中东近现代史上最激烈最残酷的战争”。

两伊战争爆发后,联合国以及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国际组织为调停战争提出了种种方案,但都无法阻止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因为“在宗教意识范围内的这些摩擦很容易采取往往通过上天的绝对价值的对抗形式,采取的不是由具体的人间的(因而可能消除)原因所引起的冲突形式,而是由‘善’与‘恶’、‘神’与‘魔鬼’的矛盾所引起的永世冲突的形式”^[5]。这种说法或许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宗教狂热和宗教情感的深刻存在使得两伊战争政治解决的艰难。

二、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的整合作用

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尤其是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导致了中东伊斯兰国际关系的分化,并对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矛盾、斗争和冲突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但是伊斯兰复兴运动所强化的伊斯兰国家对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尤其是泛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又使得伊斯兰教成为整合中东伊斯兰国际关系的重要文化机制。

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宗教具有特殊的社会整合功能,能够“把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阶级、不同职位、不同思想风尚、不同政治态度、不同文化水平、不同年龄的人紧密地‘黏合’在一起,成为具有共同信仰、共同崇拜对象、共同组织形式、共同教义和教规、共同礼仪和活动方式的社会实体和力量”^{[6](P4)}。对于共同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东伊斯兰国家而言,它可以使处于不同国度的人们从相同的历史回忆和社会心理基础中找到合作的契合点,因为相同的宗教信仰能够“赋予民族团结和认同同一的宗教品格,使不同部落、地区、种族和宗教团体的人们在一种中心的统一文化体验中聚合在一起”^[7]。

伊斯兰教作为伊斯兰民族宗教信仰、行为规范、法律制度、道德伦理的复合体,扎根于中东社会并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曾经以政教共相、族教混同之特征构建过统一的伊斯兰国家。近代以来,统一的伊斯兰帝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若干个民族国家。随着世俗的民族主义的出现与崛起,伊斯兰教在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仍然发挥着一定的团结与纽带作用,只是其作用已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但是,以伊斯兰教为文化根基的共有的历史、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念,仍然是中东伊斯兰国家认同的重要的精神基础之一。

二战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中东阿拉伯国家进行团结合作,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武器。在此阶段,伊斯兰教虽然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已经让位于民族主义,但是对于与伊斯兰教有着不解之缘的阿拉伯民族而言,伊斯兰教仍然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重要文化基础之一。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由于阿拉伯国家的惨败,盛极一时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治魅力开始褪落,伊斯兰教再次跃居中东政治的前沿,并昭示出巨大的政治感召力。伊斯兰国家深感以伊斯兰精神、道德、社会价值观为基础进行合作的必要性,从而克服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局限性。伴随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无论是伊斯兰国家还是穆斯林民众,都主张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在国际事务中以团结一致的姿态对付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1969年,沙特、摩洛哥、索马里、尼日尔、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等伊斯兰世界的数位首脑聚会拉巴特,成立了在当今中东政治和国际政治中仍有重要影响的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把伊斯兰国家间的团结合作推向了一个新高潮。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加强它们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方面的合作;努力消除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其民族权利和重返家园的斗争;支持一切穆斯林

人民保障其尊严、独立和民族权利的斗争。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自成立以来,在拉合尔、塔伊夫、麦加、卡萨布兰卡、科威特等地召开了数次会议,对于维护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促进伊斯兰国家间的团结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协调伊斯兰国家内部矛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下面笔者以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组织在促进伊斯兰国家团结合作中所发挥的作用为例,展示伊斯兰复兴对于伊斯兰国家关系的整合作用。

第一,在政治上,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构成了伊斯兰国家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政治舞台和协调伊斯兰世界内部矛盾的重要机构。

在1969年9月于摩洛哥拉巴特举行的第一次首脑会议上,集中讨论了阿克萨清真寺被毁事件、耶路撒冷地位问题、被占领土问题,各国坚信统一的伊斯兰教是伊斯兰国家彼此接近和团结的有利因素,主张恢复耶路撒冷在六·五战争前的地位,要求国际社会为使以色列撤出所占阿拉伯领土作进一步努力,并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纵火焚毁阿克萨清真寺的罪恶行径。

1974年2月在巴基斯坦拉合尔召开的第二次首脑会议上,各伊斯兰国家与会代表重申“他们共同的宗教是各国人民之间割裂不断的纽带”^{[8](p65)},并一致通过《拉合尔宣言》,谴责以色列为使耶路撒冷犹太化采取的各种措施,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即撤出耶路撒冷,声明恢复阿拉伯人对耶路撒冷的主权,是阿拉伯国家任何解决方案的先决的、必要的条件;任何一项不恢复耶路撒冷先前状况的解决方案,伊斯兰国家都绝不接受,同时反对将耶路撒冷问题国际化的任何企图。

1981年1月在沙特的麦加和塔伊夫举行的第三次首脑会议上,集中讨论了阿富汗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和两伊战争问题,强烈主张伊斯兰教是促进伊斯兰国家团结合作的强大精神力量,各国为“有《古兰经》、经训而自豪,为有《古兰经》、圣训制定的完善生活准则而自豪”^{[8](p77)},重申“全世界穆斯林是不偏向任何集团、任何信仰的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将为解放被占领的伊斯兰领土而继续全方位的圣战”^{[8](p70)}。会议通过了《麦加宣言》和《耶路撒冷宣言》,强烈谴责苏联霸权主义在伊斯兰国家阿富汗的扩张,要求苏联立即从阿富汗撤军,并申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都鼎力支持阿富汗人民的反苏斗争;号召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解放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重申维护海湾稳定及其海上、陆上安全是海湾国家的责任;对于两个伊斯兰国家间的战争,各国都深感遗憾并力求通过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呼吁两伊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要求立即停止黎巴嫩、巴勒斯坦难民营之战,消除对难民营的包围;决定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对非洲伊斯兰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

1984年,伊斯兰国家还在科威特召开了小型首脑会议,再次就阿以冲突、两伊战争、阿富汗问题协调了伊斯兰国家的立场和主张。该组织从成立到1990年,还召开过19次外长会议,为维护伊斯兰国家的共同利益,加强以伊斯兰信仰为纽带的团结合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第二,在经济上,伊斯兰首脑会议是促进伊斯兰国家共同繁荣,加强伊斯兰国家经济合作与互助,反对大国经济掠夺和经济剥削的重要国家机构。

1974年拉合尔的第二首脑会议在分析世界经济形势和伊斯兰国家现状的基础上,各国首脑认为必须消除伊斯兰国家的贫穷落后与愚昧;结束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剥削;就原材料、进口工业品和进行技术引进方面,提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条件;维护伊斯兰国家的主权及对自然资源的完全控制;伊斯兰国家之间进行经济合作与联合;减轻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品价格上涨而面临的经济困难。此后,伊斯兰国家会议组织为加强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在土耳其的安卡拉设立了伊斯兰国家社会统计研究与培训中心,在达卡设立了伊斯兰技术培训与研究中心,在卡萨布兰卡设立了伊斯兰贸易发展中心,在吉达设立了伊斯兰科学技术发展局,这些组织的成立对促进伊斯兰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互助与合作起了重要的桥梁及纽带作用,在反对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伊斯兰世界经济合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伊斯兰国家会议组织的分支机构——伊斯兰开发银行。伊斯兰开发银行经过1973年伊斯兰会议组织各国外长吉达会议的酝酿,1974年正式在吉达成立,1975年开业,到1990年已经发展为拥有43个成员国和强大经济实力的国际银行组织。该组织的宗旨是坚持伊斯兰教的原则,向其成员国对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基础项目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密切伊斯兰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与经济联系,促进伊斯兰国家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实现伊斯兰世界的共同繁荣。伊斯兰开发银行拥有法定资本20亿第纳尔,银行发放贷款的原则是不允许发放高利贷和付息贷款,以技术帮助、工农业项目的参股、租赁业务、分期付款为贷款方式。到1990年,伊斯兰开发银行进行的对外技术援助、对外贸易、提供贷款和无偿援助等多达1200余项,投资总额达77.17亿第纳尔,约合90.79亿美元^{[9](p272)}。1986~1987年,银行发放的5.873亿第纳尔的贷款,对于加快贝宁科托努港口重建工程和科摩罗的石油储藏工程、冈比亚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铁路建设、几内亚的乡村初

等教育、马尔代夫和尼日尔修建学校的工程、巴基斯坦的铁路改建工程、塞内加尔的稻谷生产以及土耳其的中东技术大学建设项目,加快伊斯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步伐起到了重要作用^[9](P273)]。1990年,第14届伊斯兰开发银行董事会议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举行,会议在改进银行工作办法、协调各成员国之间的意见分歧,以及制定银行发展规划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

第三,在文化上,伊斯兰会议组织对于促进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弘扬光大伊斯兰文化传统,加强伊斯兰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伊斯兰会议组织设立的伊斯兰历史艺术文明研究中心、伊斯兰法学会、伊斯兰文明遗产国际保护委员会、伊斯兰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伊斯兰国际通讯社、伊斯兰国家广播组织、伊斯兰国家首都城市组织等分支机构,对于促进伊斯兰文明的传播与光大,促进伊斯兰世界以伊斯兰信仰为基石的文化合作与交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伊斯兰教在伊斯兰会议组织中的作用在于:从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基础看,基于共同宗教的历史文化、精神信仰、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构成了伊斯兰会议组织建立的基石;从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成员构成来看,它是一个广泛容纳和接收伊斯兰国家的国际组织,伊斯兰信仰构成了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资格加入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先决条件;从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宗旨来看,它以维护伊斯兰国家的利益、促进伊斯兰国家的团结合作、解决伊斯兰国家间的矛盾、联合反对任何染指伊斯兰的敌对势力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由此可见,伊斯兰教作为富于历史认同感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信仰,构成了伊斯兰会议组织各成员国在国际社会进行团结合作的基石、桥梁和纽带。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产物,它作为一个最具影响力的泛伊斯兰国际组织,对于整合中东乃至整个伊斯兰国家间的关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伊斯兰国家的其他泛伊斯兰组织诸如世界穆斯林大会、伊斯兰世界联盟、亚洲穆斯林组织等,都在伊斯兰复兴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推动了伊斯兰国家关系的整合。

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不断发展,伊斯兰国家在政治上加强协调行动,力求在涉及穆斯林利益的新老热点地区发挥作用;在经济上,提出了“伊斯兰经济一体化”,创建和扩大经济合作组织。

在阿富汗问题上,经过沙特、巴基斯坦和伊朗三国的共同推动,各派于1993年3月签署了和平协议。在中东和平问题上,穆斯林国家反对以色列驱逐巴勒斯坦人,敦促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穆斯林的屠杀。在援助波黑穆斯林问题上,穆斯林国家表现出了少有的一致。伊斯兰会议组织多次开会要求联合国进行军事干预,保护波黑穆斯林。许多国家还慷慨解囊,提供各种援助。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中,土耳其、伊朗都愿意充当调停人,土耳其甚至支持阿塞拜疆一方。

在经济上,1991年12月伊斯兰会议组织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明确提出了扩大经济合作组织的内部合作,逐步走向经济一体化以及建立伊斯兰共同市场的发展方向。伊斯兰世界知名教授、费萨尔伊斯兰奖学金获得者胡尔希德·艾哈迈德在沙特伊斯兰研究中心进一步指出,伊斯兰世界要以伊斯兰会议组织和其他伊斯兰组织为中心,推动伊斯兰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建立伊斯兰公司,开辟伊斯兰金融市场,伊斯兰第纳尔与美元、英镑脱钩等一系列构想^[10]。1992年5月,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在德黑兰召开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吸收中亚五国为正式成员。伊朗还宣布建立包括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在内的“里海合作区”。1993年2月,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富汗、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巴基斯坦的奎塔举行了经济合作组织首次外长会议,一致通过“奎塔行动计划”,其主题是制订发展中西亚伊斯兰共同市场的行动计划。

参考文献:

- [1]金宜久.试论伊斯兰教的政治活力[J].西亚非洲,1990,(8).
- [2]Khomeini. Islam and Revolution, Berkley, 1981.
- [3]肖宪.东南亚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教[J].东南亚研究,1987,(1).
- [4]吴云贵.伊斯兰教与中东政治[J].世界宗教研究,1997,(1).
- [5][苏联]米特罗欣.宗教与民族[J].世界宗教资料,1991,(2).
- [6]张铁南主编.宗教知识小百科[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1.
- [7][美]格雷迪斯·B·麦克盖里.国民宗教[J].世界宗教资料,1991,(4).
- [8][叙利亚]穆瓦法格.简明伊斯兰百科全书[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
- [9]海湾纵横[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 [10]李荣.冷战后伊斯兰世界的合作趋向[J].现代国际关系,1993.

(责任编辑 敬 军)